

安阳：

中医药博物馆 姚家膏药 蓍草园



马同长中医药博物馆

马同长是安阳市脉管炎医院的院长,出身中医世家,从13岁开始从父亲那里接受中医的影响,创办了国内第一家脉管炎专科医院。

30多年前,马同长的母亲患了肺癌。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他根据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从自己收藏的药物中挑选了几种配伍成方,熬制成汤药后,给母亲服下。没有想到,奇迹竟出现了,母亲逐渐康复,病情痊愈了。

正是这件事,给了马同长以启发,那就是作为一名中医,仅仅懂医是不够的,一名合格的中医,必须对各种各样的中草药烂熟于心。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踏遍青山寻芳草。

当时,他已经积累了一些资金,但面对一个个昂贵药材,仍无力收购。为了获得这些难得的药材,他用诚心去打动拥有者。每到一一个地方,他都免费看病,尤其是面对生活在偏僻深山里的农民,他更是热情有加,精



中医之最

中医儿科最早的文字记载

中医儿科学,以中医学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中国传统的中药、针灸、推拿等治疗方法为手段,研究自胎儿至青少年这一时期小儿的生长发育、生理病理、喂养保健,以及各类疾病预防和治疗。

我国最早的有关儿科的文字记载 早在公元前14世纪,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卜辞中就发现有“𪛗”“贞子疾首”等文字。

我国最早被称为儿科医生的人 据《史记》记载:“扁鹊名闻天下……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由此可知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曾是我国最早被称为“小儿医”的医生。

我国最享盛名的儿科医学家 北宋著名儿科医学家钱乙从事儿科60年,临床经验丰富,并有《小儿药证直诀》三卷传世,对儿科学的贡献很大,故被后世尊为我国儿科的奠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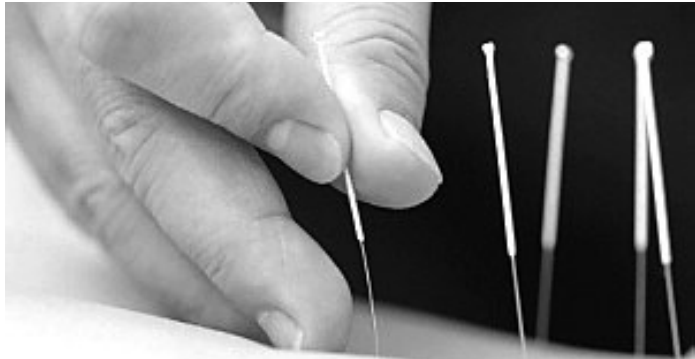
我国最早的儿科医案 在西汉名医淳于意的《诊籍》中,曾以“下气汤”治婴儿“气膈病”的记载,这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儿科医案。

我国最早预防小儿天花的方法 相传在宋真宗时,丞相王旦招揽天下能防疫者为其子种痘。四川峨眉山人用鼻吹痘苗法为之种痘,其法遂传。据考证,这是我国最早预防天花的方法,比英国琴纳氏发明的牛痘接种要早300年左右。

我国最早的儿科专著 据《四库全书》记载,我国最早的儿科专著相传为隋代以前一托名为师巫者所撰写的《颅卤经》。全书共分上、下二卷,叙述小儿疾病理、法、方、药俱备,但原书已佚失。

中医儿科学荟萃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小儿养育和疾病防治的丰富经验,随着中医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同时,随着医学和社会的发展,它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祖国和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李强)



联系人:刘静娜 投稿邮箱:570342417@qq.com

安阳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众多,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让我们来看看安阳的中医药博物馆、姚家膏药、蓍草园——



姚家膏药

姚家膏药创制于明末清初,创始人姚本仁。姚本仁,原籍江西建昌府南城,自幼钻研医术,早年远游行医。有一次,他行至安阳时,将一个已入棺送殡的少妇救活,被人们誉为“姚神仙”。崇祯七年,封居安阳的赵恪王闻其医术高明,便任命其为赵王府良医所医正。后来姚本仁辞离赵王府,在少林寺与晓山禅师共同研制主治跌打损伤的膏药,主要原料是麝香、乳香、没药、血竭、当归、木瓜等20多种名贵药材。姚本仁在黄河以南广为布施,一用辄验,颇有盛誉。顺治年间,因姚本仁名震遐迩,

被清政府赐太医院侍医。其后,姚本仁归老于邙(今安阳),居住在安阳市区鼓楼后街东头大槐树院内,开姚家膏药铺,铺名宗黄堂,铺前高悬“太医正传”巨匾,世代相传。旧时的姚家膏药立下家规:传子不传婿,传媳不传闺女,处方配伍、制作工艺严格保密。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1956年,国家投资扶持宗黄堂,姚家献出秘方,公私合营成立了安阳膏药厂,1984年更名为河南省安阳商都制药厂,1996年,被国家授予“中华老字号”企业称号。20世纪80年代,安阳膏药厂担负了唯

姜里城蓍草园

出安阳往南约行20公里,便到了姜里城,又称文王庙,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蓍草园位于大殿右后侧演易台前。

在我国古代,占卜所用的草,就是传说中神异的蓍草。除了《易传》中记载了用蓍草占卜的古老方法,其他著名的典籍中也有对蓍草的评说。而蓍草占卜也就成了易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常说“医易同源”,因为易学阐述事物阴阳动静变化的道理,中医学阐明人体阴阳盛衰消长的机制,正如张景岳所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和

麻黄



从前有位挖药的老人,收了一个徒弟。但这个徒弟很狂妄,才学会一点皮毛,就看不起师傅了。师傅就对徒弟说:“你翅膀硬了,另立门户吧!”看到徒弟满不在乎的样子,师傅不放心地说:“不过,有一种药,叫无叶草,你不能随便卖给人吃。这种草的根和茎用处不同,发汗用茎,止汗用根,一朝弄错,就会死人,记住了吗?”

“记住了。”徒弟张口就背了一遍。

自此,师徒分开,各自卖药。师傅不在眼前,徒弟的胆子更大了,虽然认识的药不多,却什么病都敢治。没过多久,这个徒弟就用无叶草治死了一个病人。死者家属当时就抓住他去见县官。县官问道:“你是跟谁学医术的?”县官命人把师傅找来,说:“你是怎么教的?”

师傅说:“小人不罪。关于无叶草,我清清楚楚地教过他几句口诀。”县官听了,就问徒弟:“你还记得吗?背出来我听呀。”徒弟背道:“发汗用茎,止汗用根,一朝弄错,就会死人。”县官又问:“病人有汗无汗?”徒弟答道:“浑身出虚汗。”“你用的什么药?”“无叶草的茎。”县官大怒:“简直是胡治!病人已出虚汗还用发汗的药,能不死人?”说罢,命人打了徒弟40大板,判坐牢3年。师傅则当堂释放。

徒弟在狱中过了3年,这才变得老实了。他找到师傅,表示痛改前非。师傅见此,便把他留下,并向他传授医术。从此,徒弟再用无叶草时就十分小心了。因为这种草曾惹过麻烦,就叫作“麻烦草”,又因为这草的根是黄色的,后来才改叫“麻黄”。

(韦良渠)

从中医古籍看动静结合养生法

丁树栋

起脏腑和机体病变。

动静养形 形体的动静状态与精气神的生理功能状态有着密切关系,静而乏动则易导致精气郁滞、气血凝结,久即损寿。因此,《吕氏春秋》中说:“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寿世保元》说:“养生之道,不欲食后便卧及终日稳坐,皆能凝结气血,久则损寿”。运动可促进精气流通,气血畅达,增强抗病邪能力,提高生命力,故张子和强调“惟以血气流通为贵”(《儒门事亲》)。适当运动不仅能

我的故乡在豫西北,在故乡的北面,巍巍太行山戛然而止,形成一片开阔的山前平地;故乡的北边,滔滔黄河缓缓东流,形成一片广阔的冲积平原。太行山和黄河像两只巨大的臂膀,将故乡紧紧抱在怀中。历史上,故乡的名称,也多和“怀”有关:上古时代,这里名为“覃怀”;秦汉时期,这里名为怀县;唐宋时期,这里名为怀州;明清时期,这里名为怀庆府。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特别适合各种中药材生长。据《焦作市中医志》记载,这里中药材品种达1288种。在这些药材中,尤其以地黄、牛膝、菊花、山药4种药材质量上乘,被历代中医药学家赞许,为道地药材,合称“四大怀药”。

故乡种植怀药的历史非常悠久。据相关地方志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故乡种植的山药和地黄,就是卫国和鲁国向周天子进贡的贡品。《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武德二年,故乡种植的牛膝成为地方进贡朝廷的贡品,随后菊花也成为进贡朝廷的贡品。明清以降,故乡的怀药种植更是到了鼎盛时期,形成户户种怀药、处处飘药香的局面。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河内县令范熙黎有感于当地怀药种植的昌盛局面,在他的《怀药诗》中写道:“乡村药物是生涯,药圃都将地亩夸。薯蓣(山药)篱高牛膝茂,隔岸地黄映菊花。”从这首小诗我们看出,种植怀药是当时农民的主要收入,山药、牛膝、地黄、菊花等“四大怀药”的品牌效应已经树立,称为道地药材,成为故乡人民引以为豪的骄傲。

伴随着怀药种植兴盛的是以贩卖怀药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怀商的兴起,怀商将怀药贩卖至全国各地甚至南洋等地,扩大了怀药的影响。怀药则以其优良品质征服了所有服用的人,“四大怀药”逐渐获得了“华药”“怀参”等美誉。

在计划经济时代,怀药价格稳定,每个村乃至每个生产队都有相对固定的怀药种植面积,每个公社都有怀药收购站,便于农民就近将种植的怀药上缴国家。我的童年时代,村里还种有大片的怀药,也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地黄花又名蜜罐,含蜜量很大,将小喇叭似的地黄花拔出来放到嘴里一吸,便可将蜜吸到嘴里,甜得很。地黄收获以后,拿着小铲到收获过的田地里捡地黄也是一件乐事,因为捡到的地黄归自己所有,可以拿到怀药收购站贩卖,所得款项可以用来买小人书。山药豆是种植山药的副产品,可以用来喂猪,也可以煮熟食用,吃到嘴里感觉很爽口,据说还很有营养。冬天没事的时候,人们可以将菊花的宿根拔出来,用水洗干净,放到嘴里嚼一嚼,感觉又麻又甜,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怀药的价格逐渐由市场决定,种植怀药也成为一项风险投资。如果运气好,种植一亩(1亩约等于666.67平方米)怀药的收入相当于数亩甚至十几亩普通农作物的收入,有人甚至可以凭借种植怀药一年就发家致富;但如果运气不好,则收入还不如普通农作物,外加种植怀药需要大量的人工投入,许多农民因此放弃了怀药的种植。近几年,由于怀药合作社的兴起,怀药种植又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由来

许多中医人常常听到这句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它把“医”与“相”并提,更使人觉得学医责任重大。可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点儿太卑微了?”范仲淹回答:“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利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

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能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人了。”

这就是后世相传“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由来。那些胸怀大志的儒者,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人生选择,正是因为医药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即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比较接近。元代戴良说得最好:“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

(王群海)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